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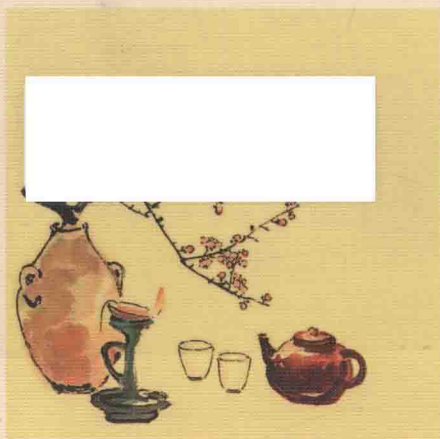
長河

文丛

李辉

著

旧梦重温时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《长河文丛》……梁由之 主编

旧梦重温时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梦重温时 / 李辉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6. 8

ISBN 978-7-5108-4569-7

I. ①旧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4009号

旧梦重温时

作 者	李 辉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责任编辑	李黎明
封面设计	吕彦秋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0
字 数	220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4569-7
定 价	45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自序：

旧梦难去，重温在心

时间无情，带走诸多往事，人们还来不及细细打量，早已烟消云散，消弭于无形。该忘记的总会忘掉，人的一生，哪能带着那么多的往事压在身上负重前行？

有的往事，如果一旦与人的命运密切相关，却很难被历史遗忘。岁月中走过，多少人历经坎坷与磨难，对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对后人是审视历史的参照。

写作三十余年，结识不同领域的前辈，听他们的故事，读他们的文字，在字里行间走进时间深处。选入此书的随笔，从胡风、冯雪峰、巴金、萧乾、赵树理，到丁聪、吴冠中、王世襄、黄苗子、郁风等，所写人物的界别不同，遭际不同，但在一个大的时代格局里，各自命运的起伏跌宕与悲欢离合，相互映衬，让我在写作时，总是感到历史如此沉重。

所谓旧梦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不能忘却的噩梦。书中所写的这些人物，个别人被“文革”浩劫所吞噬，大部分则乐观、坚韧甚至委曲求全地挺了过来，从而他们才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更加珍惜生命，珍惜文化创造的可能。

今天八月二十四日，五十年前，同一天，受尽屈辱的老舍，在北京太平湖度过了漫长的一天。他走进湖水之中，再也没有醒来。谁能想到，他的人生最后一页，竟会以这种方式惨然翻过。

又是许多年过去。书中我所熟悉的不少前辈，如今都已离我们远去。于是，我们只能在他们的往事中看历史如何艰难行进，同时，在一个容易淡忘的年代，我们反省，我们沉思。

旧梦难去，重温在心。

这是我们这代人注定的宿命。

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匆匆于北京

目 录

1	自序：旧梦难去，重温在心
001	旧梦重温时 ——“五七干校”的历史回望
026	巴金：思想史，如江水奔腾
047	胡风：风雨中的雕像
074	冯雪峰：凝望雪峰
096	赵树理：清明时节
121	萧乾：难以重叠的重叠
133	戴乃迭：嫁给中国
155	黄苗子与郁风：微笑着面对
205	丁聪：画卷就这样展开

- 235 王世襄：自己的天地
- 268 吴冠中：在黑白灰的世界里
- 282 冯亦代与郑安娜：陪都迷离处
- 294 静听教堂回声

旧梦重温时

——“五七干校”的历史回望

一

我曾有过一次难忘的黑龙江之行。

从佳木斯出发，沿松花江、黑龙江、乌苏里江而行，直至兴凯湖。那是秋天收获的季节，三江平原上的北大荒一望无际，延伸着红的、黄的色彩，煞是壮观。比起在云贵高原，或者在江南水乡看到的大一块小一块的色彩分割，似乎这里才显出了大自然的恢宏气势。行走这样的一片土地上，我强烈地感到了人可能永远只是大自然的一种点缀。

那次到北大荒是去采访农垦系统。大概和同行人的兴趣有所不同，从踏上那块人们早已熟悉的土地之日起，在感慨拓荒者的艰辛、伟大的同时，我就无法摆脱一种历史的追寻。我不能一次又一次想象着我所认识的一些老前辈，他们当年作为“右派分子”被发配到这里之后如何度过难熬的时光。聂绀弩、刘尊棋、丁聪、吴祖光……从他们那里，我早已听到过不少发生在这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，但只有当自己呼吸到这里的空气，踩着他们流过汗水和泪水的土壤，历史的感受才会更为深切。

最让我震动的是在兴凯湖农场。

在去北大荒之前，我听歌唱家张权讲过，她的丈夫莫桂新在被打为北京音乐界的“大右派”之后，被发配至兴凯湖，很快就在那里死了。她不清楚真正的死因，即便都是“北大荒人”的朋友们，说法也不一致。我在兴凯湖农场住下之后，借来场志翻阅，只在上面看到一句简单的记载：1958年9月，因一种流行性传染病，大约有十多人去世。

我去那里还是在七八年前，场志中所讲的具体是什么病我已记不清，但所说的时间，正是莫桂新去世的时间，想必所记的十多人中就包括了他。可是，我从当地一位老农垦那里，又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。当莫桂新一行“右派”被发配到这里之后，负责管理他们伙食的管理员，从中克扣贪污，把他们的粮食拿去倒卖，使他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。后来这件事被在北京的家属反映上去，北京方面要派调查团来了解。于是，场方在调查团到来那天，立即改善伙食。这些长期饥饿难耐的人们，忘记了自己的肠胃已经变得十分脆弱，不能一下子承受过多的食物和油腻。他们拼命地吃。结果，几乎所有人都立即腹泻不止，直到肠胃病蔓延，不少人相继死去。莫桂新是他们中的一个。作为一个留学归来报效祖国的著名音乐指挥家，就在那样的环境中竟以这样一种方式走完了他的人生。

听了这个故事，我的心情久久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郁和悲凉充溢。我想，回到北京之后，最好不将这样的传闻告诉张权，尽管它极可能就是事实的真相。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年了，何必再以这样的传闻来刺痛她的心。

我把它一直埋在心底。最终我也不清楚张权生前是否知道了这个故事。

那次黑龙江之行，除了北大荒外没其他地方，而且从那之后，我也没再去过黑龙江。我想，现在再有机会到那里，我或许还会去一个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十分不著名的地方——庆安县柳河。我觉得，有聂绀弩这样一些人在北大荒作映衬，有莫桂新这样一种悲剧性命运作点染，在那个十分不著名的柳河诞生的十分著名的“五七干校”，一开始仿佛就无形之中具备了某种历史的延续。这样，当今天人们有机会重新回望这种“文革”产物时，便会觉得它在历史行程中的位置变得更加突出，对许许多多走进过干校的人来说，它所具备的意义，也从而会变得更加厚重起来。

从地图上看，庆安县离哈尔滨并不远，不过“柳河”这个地名就无法在分省地图上找到了。它实在太小了，以致连在地图上占据一个黑点的位置都没有。

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柳河当然是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它之所以值得提起，是因为1968年5月7日，为纪念毛泽东的“五七指示”发表两周年，一座被命名为“五七干校”的农场首先出现在那里。在历史的卷宗里，它分明是一个门类必不可少的开篇。

翻开1968年10月5日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便会看到一整版与柳河有关的文章。通栏标题是《柳河“五·七”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》。为这篇通讯加的编者按，传达了最新最高指示：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，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，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。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。”由此，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大迁徙开始了。

率先建立起来的柳河“五七干校”，被罩上了美丽的光环。五百名来自黑龙江省直属机关的干部，在这里似乎得到了灵魂

的冶炼，以往无法解决的一切，几个月之间就迎刃而解。劳动成了万能，干校成为理想化的乐园。当一位老干部重新拿起几十年前的放羊鞭子后，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天下还有多少放羊娃、穷苦人没有解放呵！我怎能革命胜利了就享清福呢？今天赶着羊群跋山涉水，越走越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近，越走越觉毛主席亲。”

劳动、集体生活似乎具有特别的魅力，使得那些干部再也不愿意离去。他们有的把中学毕业的儿女带到了干校，有的主动要求把全家带到干校落户。究竟是确有此事，还是记者的妙笔生花，或者是根据政治需要所涂抹上的色彩，时过二十多年，已无法证实这篇通讯的真实性，即使访问柳河，那所干校肯定也已面目全非。

光环已经消失，当年影子是否尚存？

我想，最初创办这所干校的人们，很有可能仅仅是将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，将大量闲置的干部集中起来学习、劳动，在短暂的间歇之后，就会匆匆告别田间。他们怎么会想到，一个本来是区域性的带有临时劳动性质的安排，在一个混乱的年代，被拔高到令万人仰望的高度，然后，迅即推及全国，并从此引发出一场历史性的“壮举”。

熟悉“文革”的人对这种典型的树立和意义的发掘应该不至于感到奇怪。那是一个典型和创造性层出不穷的时代，仿佛只要需要，就可以如同村姑在田野里挖野菜一样随意地找出典型，找出能够印证能够体现某一构想的范例。人们的创造性也似乎被激发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，当知识被贬低时，当经济被抛弃一旁时，种种创造性的精力，也就自然而然集中在将运动不断深入、不断升华的动作之中。

“五七干校”对于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，无疑是大风暴之后的自然延续。当“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”的思路必须付诸实施的时候，“柳河五七干校”应运而生，星罗棋布的干校应运而生。

刚刚经历过“文革”初期疾风暴雨冲刷的干部们、知识分子们，重又开始一个新的历程。是喜是忧，是苦是乐，是庄重是荒唐，是一种现实必然的选择，还是一种历史的随意之笔，恐怕谁都无法轻易地做出回答。而对此的描述、归纳，也不可能圆满。不管怎么说，“柳河五七干校”在历史的记载上会留下它的大名，大概是可以确定的；“五七干校”，一个涉及千家万户命运的大壮举，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话题，大概也是可以确定的。

二

我曾设想，“文革”时发射上天的人造地球卫星，在它向大地发回悦耳的《东方红》乐曲声时，它在鸟瞰“文革”时期的中国大地时，也许会注意到，广袤的大地上，两股声势浩大的人群几乎一夜之间开始了它们的流动。

这两大人群一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一是“五七干校”的“五七战士”。在1968年的冬天，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，等待着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开始涌动。

在柳河“五七干校”被树立为典型之后仅仅两个多月，《人民日报》12月22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通讯《“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！”》，报道了甘肃会宁县城市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情，从而向所有城市的知识青年发出了到农

村去的号召。

两股人流由此而形成，开始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、状态流动。尽管年龄不同，知识层面不同，在“文革”初期所处的身份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，但在由城市向农村流动上，在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途径和要求上，他们没有差别。

1969年“两报一刊”发表的社论《五四运动五十年》，是这样概述正在形成的这两股人流的：

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发出了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伟大号召。今天，广大红卫兵小将，知识青年和广大革命干部，正在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走向农村，走向工厂，同工农兵相结合。

.....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青年知识分子，红卫兵小将，立下了丰功伟绩，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。但是，他们同样要走五四运动以来革命知识分子必走的道路——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。革命事业需要有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参加，但是，许多知识分子往往表现出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。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的弱点，只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，在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，才能够得到克服。

到底因为什么原因、出于什么目的，把城市各个层次的干部和知识者下放到农村，这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研究的课题。是城市里革命风暴难以平息时的救急方式？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难题的权宜之计？是出于改造知识者的革命选择？

历史便是这样将不同知识层的人纳入到相同的轨道。

有时我想，农村在中国似乎永远是一个巨大的空间，天生具有了容纳一切的功能。它以广袤的土地，以劳动的神圣，以海洋一般的农民，仿佛随时都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搅拌机，把一切混合起来，让所有的烦恼和难题都消融其中。

无一例外地，两股人流将从大大小小的城市出发，向农村迁徙。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科学、知识、文化，则在迁徙的同时被视为一种负担一种羞愧而抛在身后；曾被看作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农村，同样被视为一个染缸一片污水而摒弃。农村、劳动、农民，被想象为理想王国，仿佛一旦走进那里，一接近他们，城市人、知识者所有的弊病所有的缺陷，都会予以更新，从而蜕变为 20 世纪崭新的人。

不错，谁都不应该脱离劳动，谁都不能忘记中国有着广袤的农村这一现实，但让人疑惑的是，在现代文明不断进入 20 世纪每个角落的时候，缘何一定要将农村、将体力劳动变为神话，仿佛只有那里才是纯洁灵魂冶炼灵魂的所在？难道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，在那样一个年代，这是唯一的、最好的选择？

只是到了一些年后，人们才发现这是对历史的嘲弄，而反过来，历史又毫不留情地嘲弄了我们。

三

有一个问题曾经萦绕于我脑海中：同样是迁徙的人流，但当磨难过去，当历史尘埃落定之后，我们看到从其中一股人流中，走出了一个个知青作家，知青文学由此而引人注目。即便到了 90 年代，这样的势头仍然不减，不少知青和知青作家，在新环境中仍然以新的状态发出对那段历史的感慨。可是，另外

一股人流中，几乎没有走出新的作家，除了为数甚少的回忆录和散文之外，我们没有见到更多的以干校为背景的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。几年中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变动，仿佛没有在那股人流中激起多少浪花，仿佛一夜之间轰然而起的骚动，又在一夜之间趋于平静，趋于沉寂。

为什么？是那些“五七战士”已经失去了文学创作所需要的青春冲动？是因为各自在“文革”中角色的不同，使彼此对“再教育”有着不同的感受？还是因为年龄的差别而形成的人生体验，决定着他们面对现实的不同态度？

我相信答案不会是一个，甚至可能无法找到很确切的答案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询问本身就是思考的一种方式。它更是一条小径，通往历史深处。对于每个人，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可以走到路的尽头（那似乎是不可能的），而在于以什么样的姿态开始这样一个行程。

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我回望着当年那些人群出征的时刻。

两股人流各自的告别场面是如此不同。

踏上上山下乡征途的第一批知识青年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，一开始未必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改变，他们的经历和经验，远不能让他们深刻理解上面社论中所说的含义。他们不会想到，他们这些“文革”初期的闯将，辉煌与荣耀即将或者已经成为过去，未来日子的政治舞台上，他们的身影不再会令人瞩目。到农村去，那里是一个能够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，这样的号召和许诺，在最初的日子里，对他们仍然有相当大的诱惑和激发。于是，他们依然满怀豪情，依然有“革命舍我其谁”的壮志。

在这股人流的最初流动中，自愿踊跃报名的知青，占据着很大比例。似乎越遥远越艰苦，也就越有诱惑越有刺激。他们

高举红旗高唱战歌意气风发，告别亲人告别城市的依依不舍，让位于开创新事业的伟大抱负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当然更不会有凄凄切切的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的感伤，相反，还会有革命者的浪漫诗意。

对比之下，奔赴“五七干校”的出发场面，竟是如此地令人失望。也有红旗招展，也有标语飞扬，也有欢送的人群，但出发的人们绝对没有那些知青的豪情与抱负，自然也就没有了他们那种精神抖擞的状态。

不同于革命小将，“五七战士”中的大多数人，从“文革”一开始就成为革命的对象，或者大大小小的“走资派”，或者是“反动”学术权威等等。身份的不同、角色的不同，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得清楚奔赴“五七干校”对于他们所具备的意义。那里不过是城市里“牛棚”的延续，他们面临的仍然是没完没了的批斗、学习、劳动。在那里仍然需要夹着尾巴做人，仍然只能是接受改造，别无其他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，他们当然不会有知识青年那种浪漫情怀。

在一些部门，当领导各部门斗批改运动的人员向大家宣布建立“五七干校”的决定时，就已经毫不掩饰地把黯淡的前景一一描绘出来。在中国作家协会，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（简称“学部”，今中国社会科学院），连最高指示所说的可以不去干校的“老弱病残”，也都同样被列入“五七战士”的行列之中。

一位作家回忆，当作协宣布所有人员都要下放干校时，军宣队一位政委讲话说：“你们要明白，作协是砸烂单位，你们去的干校——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，你们就在那儿劳动，不要再幻想回北京来。能去的人，包括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去。

当然不愿去的，也可以找个地方投亲靠友，我们放行。”

另一位作家也这样谈到学部的情况：“当时各地都是由上边下通知，被通知的同志不得不依照规定的日子和地点集合，下‘五七干校’或插队落户。说下去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这只是表面文章，欺人之谈。你想不下去，能行么？各地的情况虽有差别，但是强迫下去是一致的。以社会科学院（前学部）为例，军代表宣布的精神三点：1. 老弱病残全都要下去，走不动的用担架抬，一个不留，这叫做‘连根拔’。2. 革命群众下去是劳动锻炼，那些头上有帽子的，下去是劳动改造。3. 那些有问题的人，我们劝告你们，别再痴心妄想回北京城了，北京城不需要你们这号人。”

在这样一种情形下，奔赴“五七干校”的出发场面，自然而然深深笼罩着一种凄清，一种感伤。当看到已过古稀之年的俞平伯，已过花甲之年的冰心、张天翼、陈翰伯等人走在下放劳动的队列之中，我想，稍稍有一些人道主义精神和正常心态的人们，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出快乐或者豪迈的情绪。

杨绛便是以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，去为钱钟书送行。这是一个令她难忘的历史场面。她看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，红旗开处，俞平伯夫妇领队当先。年逾七旬的老人，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，远赴干校上学，这一幕令她难以接受。杨绛看着心中不忍，抽身先退，她发现周围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。几年后，在那本著名的《干校六记》中她回忆了这一切。尽管她的笔调格外地简洁冷峻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文字之间渗透着的无奈和惆怅。

这该是对历史场景的一个真实记录。

或许可以说，两股人流出发场面和出征心情的强烈差别，